

人物风采

潘懋元学术风格的基本内涵

◆厦门大学高教所 高教发展中心 林金辉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倡建者和主要创始人,在我国教育界享有盛誉。2000年9月,厦门大学隆重庆祝潘懋元教授从教65周年时,教育部发来贺信指出:“潘懋元教授数十年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在高等教育战线。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教育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为创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丰富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教师,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教育学人

才,桃李满天下,为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理论骨干教师队伍和研究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活动家,对我国若干重要教育改革决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高等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杰出的教师、优秀的教育活动家,潘懋元先生的大家风范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上,而且体现在学术风格上。鲜明的学术风格,是潘先生优秀的内在素质的外部表现。关于他的学术思想,已有许多研究,但对其学术风格,还鲜见于报刊。作为潘先生的学生,作者对潘懋元先生深厚的学术底蕴、深邃的学术眼光、宽广的学术气度有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即从这三方面阐释潘先生学术风格的基本内涵。

一、深厚的学术底蕴

潘先生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观点潘先生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最能体现潘先生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在我国教育界第一个提出“教育内外部规律”的理论命题。办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又要遵循内部规律。一方面,内部规律的运用要受外部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外部规律必须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也就是说,教育必须以是否培养了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是否遵循外部规律的最终评

判标准。教育内外部规律说,是潘先生教育理论的核心和基石,它呼唤人们办教育不仅要重视外部规律,更要重视内部规律。这一观点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教育规律获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的提出,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立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范式,影响了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方式,成为制定教育宗旨的原理依据。

近20年来,潘先生多次在《红旗》、《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如“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邓小平教育战略思想的形成逻辑与超前意识”等,高屋建瓴地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将高等教育规律根据系统方法加以科学地具体化,逐渐形成高等教育规律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潘先生总是以其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指明了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

潘先生读大学时,曾辅修经济系,并修过心理学、文学、历史和逻辑学等。按照他自己的说法:“50年代以来,又研究过中国近代教育史和高等教育理论,关于高等教育的特点、教育的基本规律、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与原则、大学生的心理特征等,逐渐形成粗浅的却是自己的见解。”也正是由于潘先生深厚广博的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功底,才使他睿智过人、眼光犀利,始得以成果累累,业绩卓著。不仅在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而且在比较高等教育、教育未来学、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等研究领域也有精辟见解。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史方面,潘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史学专家。如果说潘先生的高等教育研究起步于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关注和思考,那么他对高等教育史的关注则是他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起点。在五、六十年代,他一边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一边开始对中国近现代一些重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在创立高等教育理论思想的过程中,他总是从“所从事的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的需要出发,每有求于教育史,希望能从历史研

人物风采

究中了解教育发展的规律与经验,获得某些启示和论据”(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正因为潘先生对凡涉及长期性、规律性的重大高等教育理论问题,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才使得轨迹分明,脉络清楚,研究才有深度和富有远见。

二、深邃的学术眼光

早在50年代,潘先生就独到地发现,高等专业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不是以普通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概括的。他指出了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倡导建立一门以研究高等教育特殊规律为任务的高等专业教育学,他还为此做了初步的论证。之后,他动员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的同事,在他的主持下,于1957年编出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作为院校交流讲义,印发全国。这是我国对高等教育开展全面研究的开拓性工作。此后二十年,研究工作进展缓慢。而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外的大学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彻底改变了“人们常常指责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们自己”(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司司长纳德曼)的现状,高等教育研究进入快车道。但此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及一位学者的理性呼唤却没有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舞台。尽管如此,他的追求,他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信念始终没有泯灭。

1978年,粉碎“四人帮”不久,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都有待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急需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探索高等教育的规律。潘先生抓住机遇,在我国倡导建立高等教育学,把高等教育研究推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于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有了新的起点。

为了建设高等教育学这一新学科,他在厦门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从而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基础,使高等教育学这一新学科得以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专业目录和《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词条。其后,他又带领厦大高教所师生先后跃上了几个台阶: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全国第一”、“唯一”的取得,离不开潘先生独到的、深邃的学术眼光和他在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工作中的辛勤耕耘。

不论在认识和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还是对待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潘先生都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只举一例说明。在潘先生创办厦大高教所初期,他就提出了“三个发展阶段战略”的指导思想:第一阶段,1978~1984年,以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为基本任务,促进建所工作;第二阶段,1985~1991年,以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开展科学研究;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进行较高水平与较广泛领域的科学研究,建成名副其实的全国重点学科点。实践证明,对于新学科的创建与发展而

言,这些具有超前性、预测性、发展性的规划目标,充分体现了潘先生的远见卓识。

潘先生一贯思想活跃,目光敏锐,善于捕捉事物发展的契机。近年来尽管年事已高,仍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象年轻时一样对新事物保持高度敏感和热情。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其中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大势所趋。潘先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教育理论界倡导研究民办高等教育,在厦大高教所设立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倡议召开“亚太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1995年)、民办大学校长研讨会(1999年),不失时机地提出,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就民办高等教育的定位、民办高校的产业化、质量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外私立大学发展的经验,深感立法在保证私立高等教育质量、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明确提出,对私立高等教育应当适时立法,“立法的意义不在于限制,而在于扶持、引导”。他的通过立法保障和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主张,不仅得到教育决策部门的重视和赞同,更使民办高等教育的主办者受到极大的鼓舞,有力推动了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健康的发展。对于机遇,潘先生认为,第一,机遇是常有的,但必须有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否则,有机遇也抓不住;第二,机遇和挑战并存。抓住机遇之后,还要不断开拓创新,迎接挑战。

潘先生认为,指导实践或为实践服务是理论或理论研究的主要功能,也是其价值的主要体现。潘懋元先生从不以纯学者而自居,不仅在研究过程中紧密联系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而且还非常关注高等教育政策的动向。潘先生思想解放,不墨守成规,对凡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都十分重视,积极参与并乐此不疲。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教育市场化”的倾向,致使一些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学生文化素质降低,道德滑坡。潘先生当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市场经济之于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影响,也存在负面的影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全面适应”、“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对扭转“教育市场化”的偏向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面对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他敏锐地提出,高等教育必须主动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解决好高科技与低素质的矛盾,信息高速公路进入高等学校与传统教学过程的矛盾,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新思路。他还就21世纪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大众化、私立高等教育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三、宽广的学术气度

潘先生创办厦大高教所,并在其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使厦门大学高教所无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排头兵。但他从不把考虑问题的思路局限在这个研究机构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他善于从全局着眼,从根本上观察和处理问题。70年代末以来,他不断应邀到全国各地,为教育部门和许多高等学校开设高等教育学专题讲座或作学术报告,推动了许多管理干部和教师尤其是高校领导对教育规律的研究和

坚持‘面向地方、服务社会’的 办学方针

◆五邑大学党委书记 胡百龙

在珠江三角洲率先实现现代化进军的征程中,五邑大学如何深化改革,在“科教兴粤”战略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我们近年来认真思考的问题。“面向地方、服务社会”既是五邑大学的办学方针,也是我们学校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学校建设和发展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障。

五邑大学位于我国著名侨乡广东省江门市。始建于1985年,是一所以工科为主,兼有文、理、经管、师范等多学科的普通全日制综合性大学。学校校园占地面积1000

亩,现有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现设有13个教学系部,33个本、专科专业,六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前在校各类学生逾8000人,现有教职工600余人,教师中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者占52%,青年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历者占80%,学校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为名誉教授。

自觉运用,在全国许多高等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他支持和促进了许多高教研究机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与博士点的建立和发展。他真诚地与这些单位开展交流与合作,多次邀请这些单位,共同举办“全国高教研究所(室)工作会议”、“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等。他告诫厦大高教所的同志说,有竞争是好事,不要怕别人赶上和超过我们;发展学术,没有气度不行。目前,我国的高教研究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各类高教研究机构已经达到几百个;其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教研究机构已有4个,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已有几十个。这些研究机构为我国高教学科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深的学问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使潘懋元先生的德、识、才、学、能均已达到了令人向往的高层次境界。他曾指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专业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以及人格上的影响。”(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潘先生在这方面堪称楷模。几十年来,对高教研究热心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乃至准备报考研究生的学生,写信向他求教的不计其数。即使素不相识,潘先生也是坚持有信必复,登门求教者,他总要热情接待,悉心指导和鼓励。很多这样接受过潘先生指导的、后来做出成就的人,都自称是潘先生的“学生”。潘先生这种连“著录”都没有的非“及门”弟子,遍及全国。潘先生在学术交流中,心胸坦荡,虚

怀若谷。每逢硕士生或博士生入学,他第一次报告,总要提韩愈《师说》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倡导教学相长,倡导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在学术问题上展开论争以明辨是非、激活思维,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他主张只要研究生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必与导师一致。

五邑大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创建和发展的。五邑大学的产生,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校伊始,校党委从江门五邑侨乡和中心城市

怀若谷。每逢硕士生或博士生入学,他第一次报告,总要提韩愈《师说》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倡导教学相长,倡导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在学术问题上展开论争以明辨是非、激活思维,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他主张只要研究生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必与导师一致。

潘先生的学术思想源于实践,用于实践,潘先生的学术风格也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正如在“潘懋元教授从教65周年庆祝大会”上他自己所说的,这65年的教育实践,是他的事业的“资本”。他撰文强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可行性,理论研究一定要有现实的针对性。

潘先生15岁当教师,据说,他对自己的第一堂课是不满意的,正是因为这堂课,使他立志当一名教师,当好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博士生导师,从小学校长到大学校长,他在几十年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对许多教育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65年的教育实践中,潘先生形成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术功底,形成了强烈的机遇意识、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敢为天下先的学术眼光,形成了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气量恢宏,提携后生的宽广的学术气度。这启示我们: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责任编辑:龚映杉)